

萃美温谨：明万历《绍兴府志》的 纂修体例与心学印记

汤敏 王孙荣¹

【摘要】 万历《绍兴府志》成书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共五十卷十六纲二百五十余目一百零一幅图。其内容之繁富、广博大大超过前代名志《嘉泰会稽志》，是明代尚繁型志书的杰出代表，与风行一时的尚简型志书大异其趣。这固然与修纂者自身所秉持的史志观有关，但也是绍兴一府积淀深厚的地理人文的自然书写，它法尔如是，不得不繁。因其文丰、征博、图富，成就了地方志作为一方全史、国史资材的特质，也体现了修纂者深厚学养与深切用心。该志不但内容丰富，深具史法，而且由于编纂者都是阳明学说的信徒，细加解读，便可读出心学影响的些许意味来。

【关键词】 万历《绍兴府志》 尚繁型志书 地方记忆 心学

万历十五年(1587年)，万历《绍兴府志》梓行。全志“为纲凡十有六，曰疆域、曰城池、曰署廨、曰山川、曰古迹、曰物产、曰风俗、曰灾祥、曰田赋、曰水利、曰学校、曰祠祀、曰武备、曰职官、曰选举、曰人物。为目凡二百有奇，厘为五十卷”¹。该志成于名家之手，体例精核、考证明晰、图文并茂，“《千顷堂书目》卷七、史部、地理类中，《红雨楼书目》卷二、史部，《内阁书目》卷七、志乘部，《八千卷楼书目》卷六、史部、地理类，《续通志艺文略》四，《续文献通考》卷一七〇、经籍三十卷等著录……此志为绍兴府属自《嘉泰会稽志》以来流传较广的方志”²，在绍兴地方历史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地方志史上也堪称杰作佳构。

一、成志背景：因缘具足

因者，内在因素；缘者，外部条件。绍兴府志编纂的内在原动力在于接续文献传统，书写绍兴古今人事，萃取地方记忆，凝聚文化共识，从而推进礼乐教化大务的根本需求。“绍兴，故越句践之遗墟，而东海之裔郡，肇自禹会诸侯于此，垂数千年矣！圣哲之所创营，贤豪之所表竖，既已著之简册，辉映后先，而襟带江海，山川郁纡，往往又为海内名儒达士、仙释隐逸者所艳慕而游处，故越之有志，不惟一方不可缺，亦四方所共欲遽睹者也。”当此之时，物阜民丰、文教昌隆，“越产之盛，亦未有加于此时者”，“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的心学缔造者王守仁声望如日中天，是郡人杰出代表，“越之才贤虽代不乏人，然亦未有卓然于斯道，升堂入室，若近世王公守仁之盛者”³。政治军事地位上，绍兴向为股肱之郡，“明兴，置防海诸军，绍兴实搯其吭”⁴。明代朝廷上下都重视修志，偏壤陋邦莫不有志，而偏偏东南大郡、人文渊薮绍兴，坠典久湮，此时距离南宋会稽郡通判施宿主纂《嘉泰会稽志》已达400多年之久，明代虽有绍兴府训导戴冠纂修的弘治《绍兴府志》(四十二卷)，南大吉纂修的嘉靖《绍兴府志》(十二卷、卷首一卷)，但都未能刊行，名邦缺典，不但郡人视为憾事，且为四方同所期待。

内因已经生成，还需要时与人的助缘。以“时”而论，该志肇修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越年而书成，始刊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这几年正是明神宗初掌政权、励精图治的时期，国家一度呈现繁荣昌盛的景象。绍兴府在知府萧良幹的治理下，

¹作者简介：汤敏，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杭州 310007)王孙荣，浙江省慈溪市地方志办公室方志年鉴科科长。(慈溪 315300)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院2021-2022年度课题“万历《绍兴府志》研究”(2022CYB08)最终成果

政通人和，此时辟馆修志，实乃盛世应景之举。

以“人”而言，万历《绍兴府志》主修、主纂，集学博、才优、识远、见定于一身，可谓一时之选。主纂者、绍兴知府萧良幹，字以宁，号拙斋，泾县人，明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其学私淑王阳明，是一位学者型名宦。他颇具才干，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出任绍兴知府，兴修三江闸，筑海塘，修复稽山书院，重修府署、诸多亭台楼阁等，以上诸事于万历《绍兴府志》中都有记载。⁴他甫一到任就询问掌故，得知绍兴府志已经有数十年没有纂修，于是发心礼聘郡人张元忬、孙鑛共同主修。

张元忬字子荇，号阳和，山阴人，隆庆五年（1571年）状元，尝从王畿游，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府志的另一位纂修者孙鑛，字文融，初号越峰，更号月峰，余姚人，万历二年（1574年）会元。张、孙二人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皆以中朝之望，良史之才”¹著称，不仅饱学有识，不媚时俗，而且文章法度，俱有师承。一位是状元，一位是会元，制艺之文就不用说了，张氏本是修志的行家里手，与徐渭合修《会稽县志》向为人称道，另有《云门志略》《三江考》等专志问世，兼又究心于阳明心学，造诣精深。孙氏倾心于先秦古文，成绩灿然。学问旁及百家，淹博精深，一生著述达八十余种，著述之勤，学识之广，一时罕见。而且，两位主修人都出生于世代簪缨之家，学有渊源。张元忬的父亲张天复，字复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曾官湖广提学副使、云南按察使等，主修过嘉靖《山阴县志》。孙鑛的伯父孙耀字志朝，选贡生，官至尚宝司卿，曾参加嘉靖初年《绍兴府志》的纂修。次兄孙铤字文和，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历仕至南京礼部侍郎，曾参与编修《承天大志》。作为桑梓之人，张元忬和孙鑛熟悉乡邦文献，采访较易，也为志书的成功纂修提供了有利条件。

张、孙二人本都在外为官，当时他们的身份一为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一为太常寺少卿。巧合的是两人同时丁忧在家守制。萧良幹下车伊始，即咨寻掌故，得知郡志久不举修，不免讶异叹惋。恰逢两位良史同时在郡，“太常与太史皆庐居，时岂偶耶”。他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先是甲申年谋事于张元忬，乙酉年又礼请孙鑛出山。两人谦辞不获允，便应承下来。三人同赴名山之业，私交层面上，萧良幹与张元忬不仅学宗同源，而且有同年之谊；孙鑛与张元忬交谊甚厚，曾经在京师共举文会；公的层面而言，萧良幹执掌郡符，是张、孙家乡的父母官。萧良幹与主修者理趣学宗接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难能可贵的是，他既然将修志一事相托，便对两人完全信任，孙鑛执礼不出余姚，张元忬亦未到馆，“两以执礼不入城，予命诸生挟册而就之”⁵，很有礼贤风范。萧良幹又具决断，认为“事不分任，且久而罔功。”于是将疆域、城池、山川、风俗、田赋、水利等诸卷交给孙鑛，职官、选举、人物方面则由张元忬专任（人物传中有三篇后由孙鑛完成，但观“水利志”文中有张元忬按语，或许他也参与了这一部分的编纂）。这一策略果然十分奏效。万历十三年（1585年），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设馆创修，历时一年余成稿，并于十五年刊印。

一年多来，张元忬与孙鑛各居其庐，各专己任，却书信往还，“互相参订，并志殚精，不辍寒燠”⁶。两人在具体修志主张中偶有歧见实属正常，从张元忬《寄孙越峰论志书事二通》推测，孙鑛为余姚人，对余姚县志入志人物少，“百年内，止载四公”的作法，赞之为清简。而张元忬对此并不苟同，他认为“《姚志》云，人物是非，必百年而后定。杭郡志传人物，亦以五十年为限。此特为避嫌远怨之计耳，非大公之心也。……若必待百年、五十年而后书，窃恐岁月逾远，文献益湮，将使贤人哲士之懿行卒以泯没不传，罪将焉辞？”⁷孙鑛被说服，并极表赞叹。

除主修、主纂外，万历《绍兴府志》详细开列了参与、襄赞此事者，参订人、参阅人二，分校人三，对读人八，锓梓人十四，重校人一，书写人四。身份有兵部尚书，绍兴府知事、推官、通判，儒学教谕，庠生，儒士，各属县知县，卫所守御千户等。班子成员囊括绍兴一府精英，堪称齐备，分工细密有层次。该志能阅一年而成，并足称佳志，与善得其人、职守分明有莫大关系。

万历《绍兴府志》得值时、地、人的凑泊佳会，可谓因缘具足。这大概也是历来良志修纂得以毕功的铁律吧。

二、书写风格：繁复萃美

明代修志，分尚简、尚繁两派。前者以康海纂正德《武功县志》、韩邦训纂正德《朝邑县志》为代表。因叙事简明、行文流畅，曾得到不少志家推崇。正德《武功县志》共三卷二万余字，正德《朝邑县志》二卷总约不过六七千言，两志均被推为简志楷

模，如王士禛称《武功县志》“文简事核，训词尔雅”，四库馆臣称“乡国之史，莫良于此”。但也有不少学者颇持异议，章学诚就指出“康韩二志，简而无当，潜滥荒疏”，不合史家法度。而尚繁派虽记载丰富，但是由于过于强调征实考信，列目琐碎，引文繁多，所以又有芜杂之讥。⁸对于志之繁简，主修之一孙鑛显然有自己的定夺。他在《序志》文末写到，自己对修志一事“素乏讨论，既受命，茫然未得要领。已乃取八邑新旧志割裂之，分类拈出，再反复观焉，始稍稍见端绪”¹¹。为学习揣摩志书编纂方法，孙鑛特意梳理了二十七部绍兴历代以来所纂方书，并一一评点。他这一作法，无心插柳，开创了后世方志“旧志源流考”的新体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四《史部·地理类存目三》认为该志体例颇善。末为序志一卷，凡绍兴地志诸书，自《越绝书》《吴越春秋》以下，一一考核其源流得失，亦为创格。在《序志》中，孙鑛对繁简之要有多处点评。他以为戴冠版府志“繁简无法”，南大吉版则“近简古，然太略”；张元忭、徐渭《会稽志》“文辞乐雅可观，而户书、徭役特详核”；《诸暨志》“甚详博，其考据尤精核有据”；《余姚志》“颇有史法，能删芟芜秽”；《嵊志》“文采可观，而未剪其芜”；《新昌志》“叙述详而乏体要”。¹²从以上可以窥见孙鑛是倾向于尚繁型志书的，但需繁而不芜，有体要、讲史法。事实证明主纂者如是知如是行，是志虽然卷帙多，门目众，篇幅广，但由于纲目内在联系紧密，逻辑清楚，结构紧凑，以纲领目，纲举目张，“其事具，其言核，统之有宗，而析之不紊”¹³，成为明代尚繁型志书的代表作。

万历《绍兴府志》采用纲目体，纲下有目，疆域志设沿革、隶州等七目，城池志七目，署廨志七目，山川志五卷五十目，古迹志两卷十五目，物产志十五目，风俗志不分目，灾祥志三十一目，田赋志两卷五目，水利志两卷十一目，学校志七目，祠祀志四卷十五目，武备志两卷十二目，职官志六卷六目，选举志六卷七目，人物志十五卷十五目。分类清晰、内容齐备。阅此志，疆域之沿革、陵谷之变迁、古迹之存没、风俗之醇漓、户口之登耗、赋税之增损、水利之兴废、人物之盛衰，灿然胪列，斑斑可考，实现了地方志作为“一方全史”“国史取裁”的价值所在。

是志叙述谨严有致，引征赅博精审，颇有史书法度。精审的考核必以广泛占有资料为基础。该志广引诗赋文序、史地志述，古则征之金石碑版，近则取之案牍奏章，兼及自己的亲身经历与采访所得，详为考订，庶几完备。对入志资料又能不拘一格，即便是故老时人、樵者轿夫之语，有可用者亦采录之。如卷八“山川志”记黑龙潭，注云：“余姚舆夫为余言，万历十一年，尝佣耕乌山，是年大旱，乌山乡民相聚，迎龙于兹潭”；卷十四“田赋志”有注云：“知府萧良幹曰”¹⁴，就直接以时人的言说入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附带一提的是，该志不另立“艺文志”，而是将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与山水、古迹、政治、风教、建筑等内容相关的诗文分隶于各条下，不但省却不少闲诗闲文，精简了篇幅，而且深描了主体，物质性活动与精神性创造交相映发。

是志作为尚繁型志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舆图丰富。总计疆域志附图九幅、城池志附图九幅、署廨志附图四幅。山川志，附图最为丰富。其中山图二十二幅，岭、尖、岩、洞、石图共八幅，江、河、湖、溪图十五幅。古迹志附图三幅。水利志附图十幅，包括闸图五幅，堤图两幅，塘、陡门、埭图各一幅。祠祀志附图十二幅，总计坛图三幅，庙、陵、寺、观图各二幅，祠图一幅。武备志附图九幅。总计多达一百零一幅¹⁵的舆图，继承了极盛于两宋的图经的优良传统，虚实相资，详略互见，既保存了古代绍兴府城与辖区的山川形貌、城市关隘布局，以及风俗人情、礼乐教化等大端，同时也弥补了正史无图的缺憾。

一部地方志采用何种书写风格，固然首先基于修纂者的理念与抉择，但是其背后潜藏更为深刻的是地方人士对地方精神、文化记忆的体认与想象，它以纲张目举、征文引献的形式来记载和建构历史，而形式唯有与一郡之地理、人文地位相匹配，方称合辙。万历《绍兴府志》文丰、征博、图富，正是绍兴一府绵延、厚重、萃美的地方记忆的精致外壳。

地方志有地方百科全书之美誉，“方志记述范围的广泛、内容的全面，特别是‘横分门类、纵述史实’的资料组合编纂方式，使志书呈现出事以类分、以类相从的类型化知识系列，构筑了类目清晰、结构完整的地方知识体系，为建构地方文化传统铺就扎实基础。”¹⁶万历《绍兴府志》以详赡的资料、丰富的条目、完整的架构，营建了一个内在充盈、自成一体的地方性知识世界。孙鑛在《序志》中自云“萧公虑杀青无日，乃又属人物于子苾，而俾鑛专地理焉”。可见孙鑛认同地方志性属地理书，他本人就十分博学，曾拟定《防海图说》，也有帅才，抗倭有功。这就难怪该志对技术性、知识性的内容十分重视，如记山川，并非侈谈风光，供人探幽揽胜，而是既采用严肃的地理语言，又有优雅的文学笔调。记海潮，篇幅极重。除了引用刘禹锡、苏轼等人的诗词之外，更充分引用了对海潮成因、现象做科学说明的文章，增加了志书的技术内涵。志书采用的一百零一幅舆图，虽然未能采

用计里画方的科学方法，却以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方式，从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带领读者进入一个直观的地理历史空间。它们蕴藏着丰富的信息，至今仍然是个“富矿”。疆域志、城池志、署廨志附图，对于研究府县境域的沿革、区划以及城市范围、坊里布局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山川志、古迹志附图对于形胜、地理的研究和旅游的开发利用，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武备志附图保存了明代海防设施资料。水利志附图为了解研究古代绍兴一府的水利设施提供了直观、形象的依据。学校志、祠祀志附图生动展现了明代精英与世俗的精神图谱，再现了一个大小传统相互依存的意义世界。

当然，修纂者并不满足于地方仅作为地理单元的直接呈现，“怀特认为，运用史料的语言学立场可以发现事实，但在此之外构建一个历史陈述的任何步骤都是由美学的和伦理的考虑、而非科学的考虑所决定的”¹⁷。在万历《绍兴府志》中，作者同样有着追寻美学与伦理意义的情怀与抱负。

首先，万历《绍兴府志》构建了递相绵延的美学范式。万历《绍兴府志》非常重视美学的建构。该志“山川志”五卷、“古迹志”两卷，记录犹详，且写得生动形象，状物绘景，历历如睹。绍兴山水之美，古来共谈。前有顾恺之“千岩竞秀、万壑奔流”之赞誉，复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之称赏。“山川志”开篇就引用了历代名人谈绍兴山水的名句，其内在精神不仅仅叙述山川自然之美，更体现了绍兴山水作为意境山水、心灵家园的特质。“古迹志”记叙兰亭，先是以严谨的笔触写亭的位置、由来、历史，接着便完整记叙了兰亭雅集诗文，包括王羲之《兰亭集序》、孙绰《后序》文两篇，以及谢安等人诗作三十七首，以及后人追述前朝胜事的诗文七首。这一风雅的传统并未随时代迁移而消失，志书亦记载了后世之人对它的效仿、追随。嘉靖、万历初，绍兴知府、山阴县令都对兰亭作了修缮。万历十二年（1584年）知府萧良幹又予新加，景物大为增胜。“重浚曲水之流，再载茂林之竹，继风雅于上代，尽逍遥于此生……千年奇会一旦复新，且以山川孕灵，人物世出，盛时佳赏，恐亦无逊于晋耳！”¹⁸同卷又记唐代大诗人王勃曾在会稽王子敬山亭仿兰亭修禊，“永淳二年，暮春三月，修禊事于献之山亭也”¹⁹。该志又记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创作、流传、摹本、拓印，过程甚是详尽。正是“国有废兴，人有代谢，而兰亭之名，迄配斯文，以传其事”²⁰。所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兰亭雅集在后世不断的追述与模仿中，凝固成为人们的集体记忆，万历《绍兴府志》不但记述了兰亭雅集这一历史事件，其书写本身也构成了历史。

其次，万历《绍兴府志》书写了人物各领风骚的绵厚传统。表彰一方之士，本就是南宋以后地方志书的主流思想。况且绍兴山水清越，人文郁郁，“如此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息焉”²¹。从大禹、越王勾践以下，中经王谢家族，直至当朝心学泰斗王守仁，万历《绍兴府志》所记人物风貌斑斓多彩，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赫赫熠熠，不乏震古烁今之辈。除了卷二十五到卷四十九，集中记述人物之外，在其他各卷中采用以事系人的方式分散记述。该志叙形胜、城池、山川、古迹、学校、祠祀，乃至田赋、水利、武备，无一不见人之精神风采。正如卷九“古迹志”所引宋代黄度《新昌爱亭记》“思其人而爱木，而况于山乎。”²²场所因人而显，人们翻阅志书，在一个个熟悉的场景中，遭遇了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如若耶溪之于西施，鉴湖之于马臻，山阴道之于王献之，东山之于谢安，戴溪之于王子猷，放鹤峰之于支遁，剡川之于贺知章，西村之于陆游，三江闸之于汤绍恩，稽山书院之于王守仁……志书通过引述历代相因的典籍文献、故老相传，萃炼成亲切的文化符码，激发起追忆思慕、见贤思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等美好的感情，强化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和乡邦之情。

最后，万历《绍兴府志》详载了社会治理、民生事业的迭代赓续。“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故垂法戒于将来。史之所系，诚重酌治道于兹。今志为之用自急，志固不可谓后于史也。”²³此言揭示了地方志有着很强的实用价值，它所树立的典范意义足以垂戒后世。“田赋志”修纂者自书之处，都是采用枯燥的数字，唯有通过引文才能透露出他们心之所系。如详引嘉靖二十六年（1548年）会稽县知县张鉴“申巡拦田粮、课、钞、水利、乡兵五事”，对田粮弊端明察秋毫，并呼吁为小民纾困：“时久弊生，名实混乱……则数繁多，奸弊易出……生民之害至此极矣。”绍兴府议认为张鉴所申端有见地，“事大而关国税之稽算者甚难，情重而系民心之休戚者更切……凡可以为绍民裨益者幸勿深讳”²⁴。好一个“情重而系民心之休戚者更切”，这不也是志书修纂者与本土民瘼的休戚之心吗？绍兴襟海带江，水网密布，海塘、湖泊等水利设施与人民的生活、生存干系极重，因此产生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水利文化。万历《绍兴府志》在记述水利工程的同时，再现了历代多位有担当、有情怀、有能力的地方官员为水利事业所做的贡献，如汉代开拓鉴湖的太守马臻、明代修筑三江闸的知府汤绍恩等。他们为捍卫、发展水利事业，不惜与侵占湖田的当地豪右作斗争，为绍兴人民生活生产安全，为绍兴历史文明的繁荣发展贡献才智、捐输俸禄，甚至献出生命，为后来的主

政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也是府志修纂者于历代治理之道求本溯源、详叙始末、重在当代的深刻用心所在。

是志记述有序，行文舒卷自如。志中文辞曲叙来，该略则略，应详则详，胜水佳山，因文而状；幽光潜德，因文而扬；嘉言善行，因文而传，“旁取而博考，酌古而准今，发前所未明，补前所未备”²⁵，越郡地方人文记忆萃美于一册，造极于斯。

三、法度精神：严谨温厚

参与万历《绍兴府志》参订的南京兵部尚书、余姚人赵锦说：“异日者国家发金匱石室之藏，以成一代之信史，亦将有征于斯志，非苟然者。”²⁶可见修纂者对是志成为一方信史、国家旷典的信念之深、寄托之重。成为信史，需考镜源流、体大精深，更需征实考信，字字有来历，取信于后世。前文已略述该志征引资料之浩繁详实，且凡是引用之处皆注明出处。此处拟对其注释的独到做法再作一番探讨。“注释是我国传统文献的基本的标引和解释方式，传统方志（旧志）也不例外。传统文献一般采用小字夹注。小字夹注即夹在正文中间的小字注解。”²⁷万历《绍兴府志》小字注释部分形式、作用丰富多样，有的篇幅甚至大大超过正文，扩充了志书的纵深感。其中最常见的是直接引用原文。如“疆域志”全文引用宋王十朋《会稽风俗赋并序》、孙因《越问》，以诗文证史，有助于保存资料，增加阅读兴趣。有的注释追溯历史，补充细节。如卷一“疆域志”记绍兴府城内四隅，夹注“宋太平兴国初为二乡六里，总谓之坊郭乡”。有的补充说明现状，卷三“署廨志”记上虞曹娥驿，注云“驿丞今裁革，以梁湖坝官代之，一应夫船等项仍存其半”。有表示两说并存的，如卷一“疆域志”形胜目，注云：“此段所论山脉，与周述学所云不同。未知孰是，今两存焉。”有表示存疑，姑存其说的，如卷二“城池志”古城目，注云：“按《晋书》袁名山松，此乃以嵩城为袁遗迹，疑有误。”又卷八“山川志”井目，有注云：“《嘉泰志》云……其说近诞，姑存之。”有修纂者自书的按语或议论。如卷二“城池志”记宋代刘显忠治城，小字议论：“刘显忠以其久在兵间，身履西陲要害之地，至于城壁制度，尤其熟悉。故在会稽修葺郡城，虽用功不多，而寇至可以无恐。”有表考辨的，卷七“山川志”引《水经注》记述华信筑塘，纂者辨析云：“钱唐之名自秦时已著，吴韦昭称钱塘江为三江之一，亦在六代前。谓本华信筑塘事，或未然。”²⁸此外，此志夹注还有表解释、表互见、表文献线索等作用。

所谓窥一斑见全豹，笔者之所以不惮其繁地举例说明万历《绍兴府志》夹注的形式与作用，无非是为了印证修纂者所下功夫之深、学问之博、态度之谨。万历《绍兴府志》，在时促人少的情况下，做到这些实属不易。然不可忽视的是严正端谨的史家法度之下，或有着王学思想的观照与裁量。以上曾提及，萧良幹与张元忬都学宗王阳明，萧良幹云：“王先生，绍兴人也。幹生于先生之后，私淑其道，而窃慕其邦……而两君子者（指张元忬与孙鑄），皆圣人之徒，而文成之所寄心者也。”²⁹由此三人主持修纂的府志不可能不受王学的影响。

志成之时，萧良幹欣然道：“嗟夫！文成之道，未坠于地，譬之《周礼》在鲁。”³⁰何者是文成之道呢？王阳明一生，“气节、文章、政事、勋业，足盖一世”³¹，作为私淑弟子的萧良幹“其施之政也，黜邪淫，举废坠，捍灾患，诸所注厝，都以阜民生、正风俗、长养人才为务，不择利害为趋舍，剧易为前却，凡善宦者之所顾忌，一切身任之弗辞”³²，修纂府志是萧良幹施政绍兴的举措之一，是出于兴教化、养人才、正风俗的用心，万历《绍兴府志》荟萃地方知识，传播嘉言懿行，记载良风美政，彰显了修纂者对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秩序、生活世界的追求与寄望。上文对此已略作阐明。笔者再试拈数例以探寻王学影响的蛛丝马迹。

王学认为，人人皆可成圣成贤，修纂者对人对物的评价因此多了一份体察、理解和包容。“明代修志，初以宋志为树范；至正德间体裁始变，沿史法，工词章，褒贬善恶。”³³其极端者，“柳瑛纂弘治《中都志》设‘酷吏’类，唐胄编正德《琼台志》置‘罪放’门，以为讥贬。”³⁴万历《绍兴府志》列载人物，则美人之美，“郡志自与国史不同。郡志纪一乡之贤，苟有一德一艺者，皆可书也”³⁵，凡有一言一行足可入志者，都记载之。“盖前代都督、观察使、提举、提刑诸曹节镇一方，建治东越，泽之所被者深也。虽百世，能无思乎？”³⁶统辖之官，本按例不书，但张元忬认为宜破此例，既可为百世之范，又体现了越人对历代贤守的感戴之深。唐宋以来，绍兴登进士科第者甚夥，然其中有贤不肖之别。是志具载名字，唯生平事迹可颂可扬者则简述之。开篇则论道：“士以入是选为荣，而或藉爵位以恣睢，貽笑骂于无极，则辱亦甚也，可不惧哉，可不惧哉！”³⁷“名宦志（前）”

又论曰：“职官，非贤否所系也，有其人，则书之；名宦所以录贤也，贤者录之，而不贤者可知也。”³⁸该志采用了春秋笔法，虽不具书不肖之迹，却见醒世良心。

陆游晚年为权臣韩侂胄作《南园记》，招来清议，被视作这位爱国诗人一生的人格污点。但张元忭为之辩解：“夫泉石品题，非有大关系，以时宰为求一记，而必峻拒之不已，甚乎！顾其记所云，何如耳？余于《西湖志》见此记，而详味之，其以忠献有后为言，盖歆之以法祖也。又以许闲归耕，为公之志，盖讽之以知止也。游自以为无谀辞，无侈言，殆信然矣，是又何足为病哉？甚矣，议者之固也！”³⁹可谓温厚公允，大有仁者之心，比见解固陋、人云亦云之辈高明多了。

地方风俗的美恶一向是修志者系念甚深之处。明中期后，朝野之士大多倾向认为时风日坏，尤其是奢侈之风的增长腐蚀世道人心。但是“世风日坏”的结论、担忧本是千古同慨。万历《绍兴府志》对此有自己鲜明的态度。“而侈靡竞出世治，盛隆四方，皆若斯，独吾越乎哉？然俗沿于土，依于闻见，虽稍以时变易，综其实，固不甚远也。诸邑志乃或称先辈长者，其时皆崇孝弟，尚廉耻，畏刑辟……似太过。又云：今之所安者，父母死，不哀戚，乃反高会召客，如庆其所欢；民不力本业，而博赛以为生……又似诋太过。若夫婚，论嫁财率破家乃至，生女则溺之，嗜货利，崇富而贱贫，兄弟好财异别籍，则诚恶俗，然自昔已然，或更甚，不可谓今人始也……语云：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察于野人、君子之论，大要睹矣。”⁴⁰修纂者以辩证发展的眼光审视地方风俗的变与不变，认为古人有胜过今人之处，而今人亦有超越古人之处，不可认为今一定不如昔。而绍兴风气也不可能不受别处的影响，世风所染，往往概不能外。各县志对本地风俗或过分誉美，或过于贬低，自然不为府志所取法。要考察盛衰的轨迹，不如去听听野人、君子的议论吧。此诚为知人论世的持平之论。张元忭云：“余与文融不徇迹而逆心，必考衷而求是”⁴¹，“心即理”，以真心体察、观照，才能明了事物迁流之理，才能做到不人云亦云，求真求实。

结语

几乎是单凭二人之力，以一年多时间，纂成五十卷的志书，万历《绍兴府志》白璧微瑕实所难免。如将山东郯县与浙江剡县混而为一，以致徐孝嗣、徐摘、徐陵等人均被收入人物志内。张氏在理学传中所录王门弟子仅徐爱、季本二人而已。作为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为了避嫌起见，后来也只能以“盖两公者，省志、邑志之所已载，且其人歿久而论定矣。其他贤者固多，而旧乘未载，固未敢遽入也。……顾余拘儒也，竟未敢破例而为传，尚有俟于后之君子焉”⁴²为藉托。可见撰人物志压力之大，非特史才、史学、史识，另有舆论在焉。对于时促人少而造成的问题，修纂者亦有清醒认识：“人众则议论难齐，时久则机会易失。乃今专任而成速，是其所以得也。然而蒐罗之未广，扬摧之未精，则亦惟人寡而时促焉耳”⁴³；“今郡中不逾数百里，曠生于斯而未及遍历，惟以往籍证，难矣，此所以顾望未敢遂者也。异日得闲，尚期掉舟蹶屣，尽探诸名迹，询问遗老，补所阙，证谬误焉。”⁴⁴以上虽不乏自谦之词，但确实体现了千古修志之难，后之修志者闻言能不戚戚于心吗？

万历《绍兴府志》是前人留下的珍贵的历史文献，是对绍兴作为东南名郡、人文之邦的再次体认与确认。它以严密的架构、丰富的资料、严谨又富有温度的表达建构了一个完整且鲜活的地方世界。它既摹写形胜概要，亦能使人兴起“晋代衣冠成古丘”的兴亡之感；既荟萃人物风华、物产繁荣，又记录海潮等自然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侵夺，倭寇入侵造成的破坏与绍兴人民抗倭斗争等史实；既记述历代宰守治理越地的辉煌政绩，也可见人民由于豪右横行、贡赋沉重而蒙受的痛苦；既展现了绍兴科名冠带之盛况，也将丐户这一陋俗载之于册。地方历史既是层累地造成的，也是多面向、非线性的，盛中有衰、衰中有盛实乃客观规律。修纂者怀着资政用、导风俗、养人才的责任意识和桑梓深情，用“心”体察地方的嬗变踪迹与现实状况，方能成就这一方信史、全史。

注释：

1(3)(6)13(23)(25)赵锦：《绍兴府志序》，载萧良幹修，张元忭、孙鑛纂，李能成点校《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宁波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
- 2 陈桥驿：《绍兴地方文献考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8 页。
- 3(4)《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卷一“疆域志”，第 18 页。
- 4(5)《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前言 3。
- 5(7)(29)(30)萧良幹：《绍兴府志后序》，载《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第 928、928~929、929 页。
- 6(8)(41)(42)张元忬：《绍兴府志序》，《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第 3 页。
- 7(9)(35)张元忬：《张阳和文选》卷二《寄孙越峰论志书事二通》，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7、28 页。
- 8(10)黄燕生：《明代的地方志》，《史学史研究》1989 年第 8 期，第 64 页。
- 9(11)(12)(44)孙鑛：《序志》，载《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第 926~927、923~926、927 页。
- 10(14)上引两条分别见《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第 183、311 页。
- 11(15)此数据根据原书目录，详见《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第 8~9 页。
- 12(16)陈野：《建构文化传统：中国方志的深层功能》，《浙江学刊》2021 年第 1 期。
- 13(17)转引自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 20 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3 期。
- 14(18)陈霍：《与荆州太史约修兰亭旧约书》，载《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卷九“古迹志一”，第 204 页。
- 15(19)王勃：《修楔云门献之山亭叙》，载《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卷九“古迹志一”，第 206 页。
- 16(20)文征明：《重修兰亭序》，载《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卷九“古迹志一”，第 204 页。
- 17(21)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载《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卷五“山川志二”，第 129 页。
- 18(22)《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卷九“古迹志一”，第 210 页。
- 19(24)《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卷十四“田赋志一”，第 303~307 页。
- 20(26)(32)赵锦：《绍兴府志序》，载《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第 2 页。
- 21(27)赵峰：《论旧志夹注——以明正德〈松江府志〉、清光绪〈青浦县志〉为例》，2014 年第四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论文汇编》，第 213 页。
- 22(28)以上诸条分别见《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第 6、65、20、46、188、36、157 页。

23(31)《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卷四十二“人物志八”，第820页。

24(33)陈光贻：《稀见地方志提要》自序，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2页。

25(34)巴兆祥：《明代方志纂修述略》，《文献》1988年第9期，第156页。

26(36)《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卷二十五“职官志”，第509页。

27(37)《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卷三十三“选举志四”，第628页。

28(38)《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卷三十七“人物志三”，第692页。

29(39)《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卷四十“人物志六”，第775页。

30(40)《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卷十二“风俗志”，第261页。

31(43)《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卷四十二“人物志八”，第822页。